

北宋沿邊安定堡漢蕃軍民的護國萬菩薩堂 ——陝西子長北宋鍾山第10窟主題思想探析*

石建剛

西北工業大學

摘要：鍾山石窟位於北宋臨近西夏的極邊地區，是在宋夏戰爭背景下，由安定堡漢蕃軍民共同出資營建的，具有強烈的政治和軍事屬性。鍾山石窟第10窟的營建受到五臺山信仰的強烈影響，以萬菩薩造像及其信仰為中心，肩負着護國佑民、撫慰漢蕃軍民心靈創傷、凝聚人心等一系列特殊使命和功能，乃是安定堡漢蕃軍民的“護國萬菩薩堂”。

關鍵詞：鍾山石窟、萬菩薩、陝北宋金石窟、宋夏戰爭、護國思想

鍾山石窟，位於陝西省子長市安定鎮賀家溝村，西距古安定堡約1500米。石窟坐北面南，背靠鐘山，前臨秀延河（圖1），共由13座洞窟組成（圖2），自西向東依次編號，其中第10窟為主窟¹。第10窟開鑿於北宋治平四年（1067），是一座超大型立柱式中央佛壇窟，造像精美，內容豐富，乃是中國北宋石窟的代表。



圖1 鍾山石窟位置示意圖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陝北宋金石窟多元文化特性研究》（項目編號：19CZJ01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¹ 本文一律採用《陝西石窟內容總錄·延安卷》（《陝西石窟內容總錄》編纂委員會編，西安：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陝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17-750頁）中的洞窟編號。



圖 2 鍾山石窟窟龕分布示意圖

有關鐘山石窟，特別是第 10 窟，學界已有不少調查和研究。其中，基礎內容調查主要見於靳之林、姬乃軍、李淞、何立羣、石建剛等學者的論著²，近年出版的《陝西石窟內容總錄·延安卷》和《延安石窟碑刻題記》³可以看做是對這一工作的一次總結。相關研究主要見於津田徹英、萩原哉、根立研介、李靜傑、林鐘奴、石建剛等學者的論著，以對三佛、地藏十王、自在坐觀音、涅槃、比丘等造像

² 靳之林《延安地區石窟藝術》，《美術》1980年第6期，第3-7頁；姬乃軍《延安地區的石窟寺》，《文物》1982年第10期，第19頁；李淞《陝西古代佛教美術》，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2-192頁；何立羣《延安地區宋金石窟分期研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石建剛《延安宋金石窟調查與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20年。

³ 前揭《陝西石窟內容總錄》編纂委員會編《陝西石窟內容總錄·延安卷（中）》，第717-750頁；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編《延安石窟碑刻題記》，西安：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陝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15-394頁。

題材及其思想的研究為主⁴。然而，有關洞窟主題思想的探討則較為滯後，筆者不揣淺陋，試就此略做探討，以期拋磚引玉。

一、從五臺山到鍾山石窟：萬菩薩像及其信仰考釋

鍾山第10窟造像題材頗為豐富，包括三世佛、自在坐觀音、地藏、騎獅文殊與乘象普賢、涅槃、萬菩薩、千佛等，但最能代表洞窟主題和核心思想的當是中央佛壇上的三世佛和環列於壁面間的萬菩薩造像。因此，這一部分我們將着重從這兩類造像題材入手來探討洞窟的主題。

(一) 三世佛造像：以佛光寺東大殿為規範

萩原哉先生在考察鍾山第10窟三佛造像身份的過程中，特別注

⁴ [日]萩原哉《三世仏の造像—鐘山石窟第3号窟の三仏を中心として—》，收入岡田健等《中国陝西省北宋時代石窟造像の調査研究—子長県鍾山石窟を中心として—》，平成13～15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2004年，第21-34頁；又載《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56卷第1号，2007年，第489-486頁；[日]津田徹英《鍾山石窟第3窟の基本構想と信仰基盤》，收入前掲岡田健等《中国陝西省北宋時代石窟造像の調査研究—子長県鍾山石窟を中心として—》，第35-50頁；[日]根立研介《10世紀から13世紀にかけての日本彫刻史における中国美術の受容について—鐘山石窟3号窟の老比丘形像を手掛かりとして—》，收入前掲岡田健等《中国陝西省北宋時代石窟造像の調査研究—子長県鍾山石窟を中心として—》，第51-64頁；李靜傑《唐宋時期三佛圖像類型分析——以四川、陝北石窟三佛組合雕刻為中心》，《故宮學刊》2008年第4期，第309-341頁；李靜傑《中原北方宋遼金時期涅槃圖像考察》，《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3期，第22-46頁；林鐘姣《陝北石窟與北宋佛教藝術世俗化的表現》，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李靜傑《陝北宋金石窟題記內容分析》，《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3-115頁；李靜傑《陝北宋金石窟佛教圖像的類型與組合分析》，《故宮學刊》2014年1期，第92-120頁；石建剛《延安宋金石窟調查與研究》第五章《延安宋金石窟部分造像題材研究》第二節“延安宋金石窟地藏與十王及地獄圖像研究”，第369-420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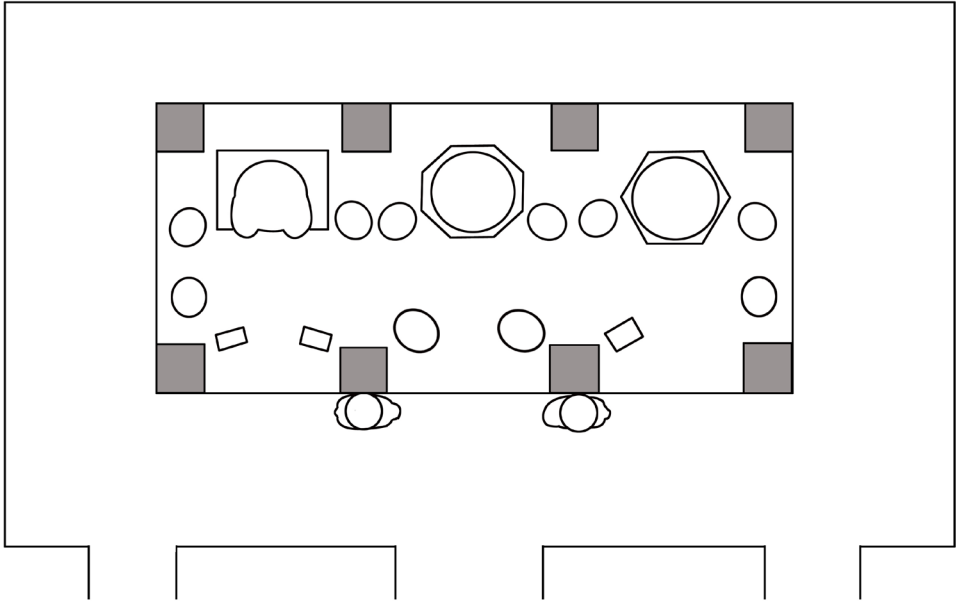


圖 3 鐘山第 10 窟主室平面示意圖

意到該窟佛壇造像組合與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在造像配置方面的相似性，認為其很有可能是以後者為規範的⁵，這一論斷為我們深入理解洞窟主題思想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線索。

鐘山第 10 窟為典型的中央佛壇窟（圖 3、4），洞窟平面略呈梯形，前寬 16.10、後寬 16.40、進深 9.60、前高 5.04、後高 5.40 米。中央佛壇呈橫長方形，橫寬 11.00、縱深 4.50、高 1.40 米。佛壇上共有八根方形通頂石柱。中央佛壇上安置三佛（圖 5），中間佛像，右手作說法印，左手撫膝，結跏趺坐於須彌仰蓮座上；右側佛像，同樣為右手說法印，左手撫膝，倚坐於方形臺座上；左側佛像，雙手交疊於腹前結彌陀定印，結跏趺坐於須彌仰蓮座上。此三佛的身份比較

⁵ 前掲[日]萩原哉《三世仏の造像：鐘山石窟第 3 号窟の三仏を中心として》，第 23-28 頁。



圖 4 鐘山第 10 窟中央佛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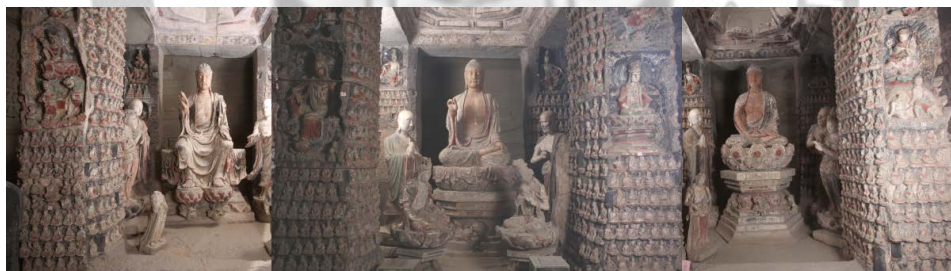


圖 5 鐘山第 10 窟三世佛(拼接圖)

清楚，中間為釋迦佛、右側為彌勒佛、左側為阿彌陀佛（本文所指左右方位以佛像自身為準）。

佛光寺位於晉北地區五臺縣城東北 60 公里的佛光山腰間，現存的佛光寺東大殿是在“會昌滅法”之後營建的，大中三年（849）開工，京都女弟子寧公遇會同宦官王守澄及地方官吏佈施，在高僧願誠的主持下，重修東大殿，大中十一年（857）完成。東大殿，坐東面西，面

闊 34.15、進深 17.7 米，單檐廡殿頂。大殿中央有橫長 26.67、縱寬 6.55 米的長方形大佛壇，佛壇上布列三世佛、騎獅文殊、乘象普賢等唐代彩塑 30 餘尊。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殿內中央同樣是以三佛造像為主體（圖 6），中間為持鉢的釋迦佛，右側為施轉法輪印的阿彌陀佛，左側為施無畏印倚坐的彌勒佛。三佛為釋迦佛與彌勒、阿彌陀佛組成的三世佛，鍾山石窟三佛身份與其完全一致。但是，在鍾山第 10 窟三佛組合中，一反常態，將阿彌陀佛與彌勒佛的位置對調，萩原氏認為隱含有要將本窟三佛單純視為豎三世佛的意義⁶，可備一說。



圖 6 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塑像

（採自柴澤俊、柴玉梅《山西古代彩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年，第 191 頁，圖版八）

⁶ 前掲[日]萩原哉《三世仏の造像：鍾山石窟第 3 号窟の三仏を中心として》，第 26 頁。

鐘山第10窟中央佛壇，以八根立柱區劃的三個空間中，各安放一尊佛像，而壇基左右兩側立柱上雕刻成對的乘象普賢和騎獅文殊像。這裏需要注意兩點內容：第一，該窟所見的兩組騎獅文殊與乘象普賢造像組合，均表現為文殊在右、普賢居左的組合形式，與佛光寺東大殿的配置形式一致；第二，該窟騎獅文殊與乘象普賢造像，均來自五臺山佛教故事，佛光寺東大殿的騎獅文殊和乘象普賢造像組合亦均是以五臺山佛教故事為依據。就目前所知，這種三世佛與文殊、普賢的造像組合形式最早即出現於佛光寺東大殿。可見，鐘山第10窟受到了五臺山的深刻影響。

（二）萬菩薩像：從開窟題記到洞窟主題

以往，學者在討論鐘山第10窟主題時，均以中央佛壇三佛造像為核心。然而，該窟中央佛壇前檐有一方題記，屬開窟題記，其內容卻為我們探討該窟主體思想提供了新的思路。該題記內容如下：

治平四年（1067）六月二十六日，□州界安定堡百姓張行者發心打萬菩薩堂，□人百姓等五人，王信、薛成、馮義、孫有、孫王打堂以後，皇帝萬歲，重臣千秋，國泰民安，合家安樂，□□神虎□人雷澤，刊字人李溫立記。

題記中稱該窟為“萬菩薩堂”，這是開窟者對洞窟的命名，顯然成為解讀該窟主題的關鍵所在。洞窟前廊後壁有一方金代的《重修普濟院萬佛岩碑》，在記述洞窟主要造像時提及三世佛和一種被稱為“萬菩薩”的造像題材，其內容為：

於是命工匠王信等（中間數字殘失）三世尊，環列萬菩薩。

顯然，開窟者將該窟命名為“萬菩薩堂”與這類萬菩薩造像存在直接關聯，所以要想真正理解該窟的主題思想，必須從這類萬菩薩像入手。

考察洞窟各壁面和柱面造像我們會發現，除一些較大的龕像外，其餘則由成排的小佛像和小菩薩像組成。其中，洞窟左、右壁，前半部為小菩薩像（圖 7），後半部為小佛像；洞窟前壁，最西側壁面為小佛像，其餘均以小菩薩像為主；佛壇八根立柱，後排西 1 柱西向面和後排東 1 柱東向面為小佛像，其餘柱面均以小菩薩像為主。這些成排的小菩薩像應正是銘文所述“萬菩薩像”。這些小菩薩像，形象各異，神態生動。頭飾，或束高髮髻，或戴花冠、高冠；衣着，或為菩薩裝，或為佛裝；雙手，或為不同手印、手姿，或持各類法器；坐姿，以跏趺坐和自在坐為主。前壁和左右壁前半部小菩薩造像均無臺座，下方雕刻祥雲，其餘壁面和柱面的小菩薩像下方多雕刻有臺座，無祥雲。

在陝北及其周邊地區的石窟中，除該窟外，在延安清涼山第 11 窟（北宋熙寧三年至元祐元年 [1070-1086]）、富縣石泓寺第 7 窟（金代皇統元年至貞元二年 [1141-1154]），以及合陽梁山千佛洞石窟（金代皇統九年至貞元元年 [1149-1153]）中也出現了這一造像題材，且在石泓寺和梁山千佛洞石窟的造像題記中亦均將這類小菩薩造像稱為“萬菩薩”，如：

黑水鄉趙氏，觀音一尊，小萬菩薩七十尊，男劉十一。



圖7 鐘山第10窟前壁萬菩薩像

(石泓寺第7窟後壁)

我(道遠)亦欲即梁山前崖掘石室，鏤萬菩薩像龕其中，使垂不朽……當尊刻文殊像，列萬菩薩於楹壁。(梁山千佛洞金貞元二年(1154)《梁山壽聖寺石窟銘並序》)

可見，鐘山第10窟所見小菩薩造像在宋金時期被稱為“萬菩

薩”當無疑，那麼這類“萬菩薩”到底是何身份，出自哪裡，有何經典依據？

查閱佛典，“萬菩薩”一詞歷代皆有，類似的還有“十萬菩薩”、“億萬菩薩”等說法，早期多是泛指菩薩衆，旨在表現菩薩衆多之意。到了唐宋時期，“萬菩薩”一詞依然保留了泛指菩薩衆的含義，但同時也出現了特指五臺山一萬菩薩的固定用法。衆所周知，五臺山萬菩薩一般是作為五臺山文殊或普賢菩薩眷屬的身份出現，與五臺山信仰存在密切聯繫。東晉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菩薩住處品》記載：“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諸菩薩常於中住；彼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有一萬菩薩眷屬，常委說法。”⁷ 隨着華嚴學的廣泛傳播，這種正典中的說法逐漸為信衆所熟知，山西的五臺山被比附為佛典中的清涼山。伴隨着五臺山及文殊信仰的興起，作為其眷屬的一萬菩薩也逐漸成為了一種固定的崇拜對象，被冠以“萬菩薩”的稱謂。唐宋時期類似的記載不勝枚舉。如李邕《五臺山清涼寺碑》記載：“惟時孟秋月望，慶雲出山，西北圓光，五百餘丈，有萬菩薩，同見其間，前後感應，不可遽數，意者其福我聖君乎！”⁸ 再如《續清涼傳》卷下記載，元祐四年（1089）太原潘璟“於清輝閣前松林中，祈見白光三道直起，萬菩薩對仗略列。”⁹

五臺山萬菩薩在唐宋時期得到廣泛傳播和信仰，逐漸成為脫離文殊、普賢而獨立崇拜的對象，因而不僅出現了專門的萬菩薩圖像，而且還修建了不少專門供奉萬菩薩像的“萬菩薩院”、“萬菩薩堂”、“萬菩薩樓”等佛寺建築。相關的文獻記載和考古實物眾多，以下僅列出

⁷ 《大正藏》第 0278 號，第 9 冊，第 591 頁下欄第 1-2 行。

⁸ （清）董浩等編《全唐文》卷二六四，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2679 頁。

⁹ 《大正藏》第 2100 號，第 51 冊，第 1131 頁下欄第 4-5 行。

部分較具代表性者：

《金光照和尚碑》記載，金光照和尚“唐大曆二年（767），方達五臺山，於大華嚴寺萬菩薩院安至。”¹⁰

唐五代時期的莫高窟五臺山圖中，繪有明確榜題的“萬菩薩樓”（圖8）“萬聖之樓”¹¹。



圖8 莫高窟第61窟五臺山圖之“萬菩薩樓”（採自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圖版60）

¹⁰（宋）釋延一《廣清涼傳》卷下，見《大正藏》第2099號，第51冊，第397頁下欄第17-19行。

¹¹ 相關研究見趙聲良《莫高窟第61窟五臺山圖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106頁。

長安西明寺沙門釋圓照集不空和尚《表制集》中收錄有不空《請抽化度寺萬菩薩堂三長齋月念誦僧制一首》，其附言中稱之為“化度寺護國萬菩薩堂”¹²。另，據段成式《寺塔記》記載，長安城宣陽坊靜域寺內也設有專門的“萬菩薩堂”¹³。

據《玉堂閑話》記載，麥積山“將及絕頂有萬菩薩堂，鑿石而成，亘古今之大殿，其雕梁畫棟，秀棟雲楣，並就石而成，萬軀菩薩列於一堂。”¹⁴

北京的萬佛堂有一組唐大曆年間(766-779)的“文殊普賢萬菩薩法會圖”造像，現存大德元年(1297)《重建龍泉大曆禪寺碑》載“復詣洞水之上造玉石文殊普賢万□(菩)□(薩)。”¹⁵

郭俊葉先生《敦煌石窟中的萬菩薩圖》一文，則對敦煌莫高窟中的萬菩薩圖像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和研究，認為莫高窟158窟窟頂(中唐)、161窟四壁和四披(晚唐)、196窟東壁門兩側(晚唐)、138窟西壁(晚唐)、12窟前室南北壁(晚唐)所見，成方陣式有序排列的小菩薩均為五臺山萬菩薩圖像實例。該文是目前唯一一篇專門研究萬菩薩像的文章，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¹⁶

《佛祖統紀》卷四三記載：“[太平興國]五年(980)正月，勅內侍

¹² (唐)圓照集《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見《大正藏》第2120號，第52冊，第834頁下欄17-18行、第835頁上欄1行。

¹³ (唐)段成式著，秦嶺雲點校《寺塔記》，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第23頁。

¹⁴ (宋)李昉《太平廣記》卷三九七，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181頁。

¹⁵ 有關該處造像的基本情況介紹，參見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萬佛堂孔水洞調查》，《文物》1977年第11期，第16-23頁。相關造像圖版可參見韓永編《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雕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7-94頁，圖版48-53。

¹⁶ 郭俊葉《敦煌石窟中的萬菩薩圖》，收入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編《藝術史研究》第17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13-317頁。

張廷訓，往代州五臺山造金銅文殊萬菩薩像，奉安於真容院”¹⁷。

《大明高僧傳》史傳部《天台佛隴修禪寺沙門釋行可傳四》載：元代“成宗建萬聖寺於五臺，詔求開山第一代住持。時帝師迦羅斯巴薦之，成宗即鑄金印署為真覺國師，總釋源宗兼祐國住持事，帝師賚旨起師”¹⁸。

萬菩薩圖像及其信仰至遲在盛唐時期已經獨立出現，唐以降直到元代在中國北方地區均非常流行。由此，我們也不難確認鐘山第10窟的“萬菩薩”，正是特指五臺山的萬菩薩，該窟亦正是以五臺山萬菩薩信仰為主題的“萬菩薩堂”。

在鐘山第10窟右側兩立柱正面浮雕有3龕騎獅文殊造像，且這3龕造像有一個顯著的共性特徵，即造像下方均有祥雲承托，長長的雲尾拖向遠方，表現出從天而降的動感（圖9）。孫曉崗先生認為這些騎獅的文殊造像均是五臺山文殊化現故事的一種表現形式¹⁹。洞窟東側兩立柱正面各有1例乘象普賢造像，造像也均表現為乘雲而來的形象，有趣的是，在後東1柱南向面造像中，乘象普賢下方雕刻了三身虔誠跪拜的比丘像（圖10），表現的正是比丘僧朝拜普賢化現的故事情節，說明其內容同樣屬於五臺山化現故事的一種。而我們注意到，該窟所見萬菩薩、十地菩薩、十方佛等造像亦均特意雕刻為乘雲形象，當同屬五臺山化現的一種表現形式。唐代高僧不空在描述位於長安城的化度寺護國萬菩薩堂時，稱其“乘雲駕象凌亂楹梁，光明滿堂不異金閣”，鐘山第10窟所見與此頗為相仿。

¹⁷ 《大正藏》第2035號，第49冊，第397頁下欄第14-16行。

¹⁸ 《大正藏》第2062號，第50冊，第906頁中欄第8-12行。

¹⁹ 孫曉崗《文殊菩薩圖像學研究》，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第10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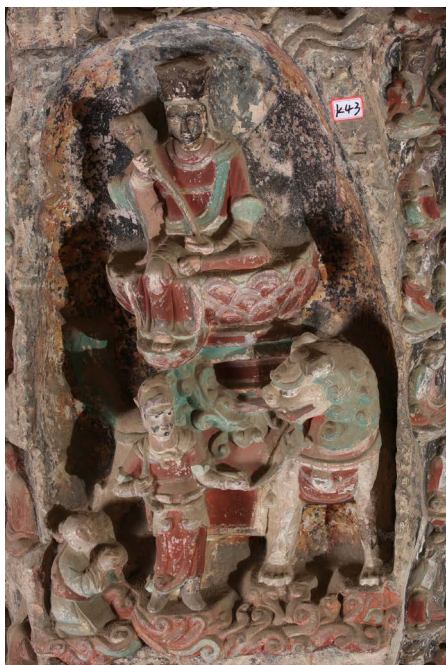


圖 9 鐘山第 10 窟前排西 1 柱
正面文殊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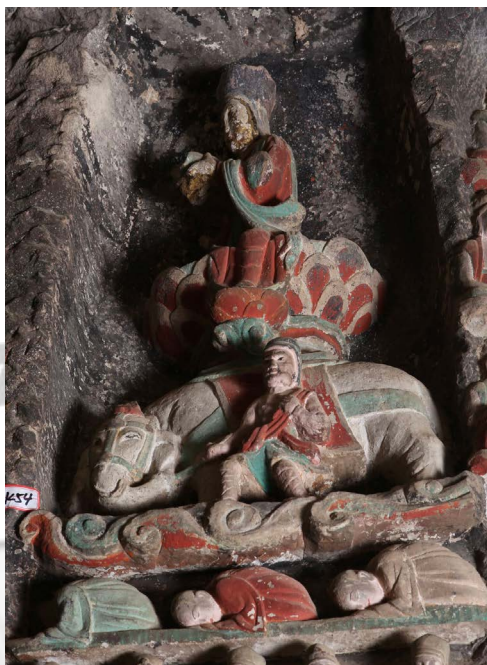


圖 10 鐘山第 10 窟後排東 1 柱
正面普賢造像

二、從鍾山石窟到安定堡：鍾山石窟軍事屬性剖析

安定堡，東距鍾山石窟約 1.5 千米，因宋夏戰爭需要，北宋慶曆中葉建成，是宋夏沿邊地區一處重要的軍事堡寨。鍾山石窟緊鄰安定堡，由安定堡的漢蕃軍民共同營建，乃是附屬於安定堡的佛教寺院。由於鍾山石窟對安定堡的特殊依存關係，使得其受到安定堡軍事屬性的深刻影響。

(一) 宋夏戰爭為鍾山石窟提供了信眾基礎

對處於宋夏沿邊地帶的鄜延地區而言，長達百年的宋夏戰爭，不僅造成大量士卒傷亡，而且也使當地百姓長期處於生靈塗炭、朝不保

夕的悲慘境地。史書對此多有記載，筆者在此不做贅述，僅舉《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載一例：

慶曆四年（1044）五月知制誥田況言：所謂搬輦勞弊者，自西事以來，廊延一路，猶苦運輸之患。卞咸在鄜州，欲圖速效，自鄜城、坊州置兵車，運糧至延州，二年之內，兵夫役死凍殍及逃亡九百餘人，凡費糧七萬餘石，錢萬有餘貫，才得糧二十一萬石。道路吁嗟，謂之地獄！²⁰

長期以來的宋夏戰爭和因戰爭而來的軍事補給問題，以及當地惡劣的自然條件，給長期生活和駐守此地的軍民百姓造成了巨大創傷，這種創傷不僅是肉體的，還是心靈的。而佛教作為當時漢地最大的宗教，自然承擔起軍民百姓慰藉心靈和寄託信仰的社會功能。因而，這一時期，佛教以及作為佛教重要載體的石窟寺在鄜延地區快速發展起來，這正是包括鐘山石窟在內的陝北宋金石窟大量興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這種長期戰爭環境下，官方和民間均有意或無意的支持佛寺發展，借此撫慰兵士和民衆的心靈創傷、提高士氣、促進民族融合、維護統治。《宋史·滕宗諒傳》記載：

葛懷敏軍敗於定州，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諜知寇遠近及其形式，檄報旁郡使為備。會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

²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611頁。

州戰歿者於佛寺祭酌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於是邊民稍安。²¹

北宋安塞樊庄石窟第2窟後壁的開窟題記：

大宋之國延安之境，邑屬敷政防戎於第五將籍定在招安一警，儘威勇之心，難生善意，施主各發心建立真容，望見像皆生善意。元祐八年（1093）創修未了，紹聖丙子年（1096）逢西賊侵掠，至政和癸巳年（1113）再修了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三“仁宗天聖三年（1025）冬十月庚申”條記載：

陝西轉運司言，秦州蕃官軍主策拉等，請於來遠寨置佛寺，以管往來市馬人，從之。²²

這些材料記載，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北宋西北沿邊地區佛寺與戰爭之間的密切關係，反映出沿邊地區漢蕃軍民對佛寺的依賴，所以說正是宋夏戰爭為石窟寺的建造提供了信眾基礎，鐘山石窟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者。

（二）宋夏戰爭為鐘山石窟提供了經濟基礎

由於宋夏戰爭，大量人力、財力和物力從全國各地流向西北的鄜

²¹ (元)脫脫等《宋史》卷三〇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037-10038頁。

²²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三，第2390頁。

延等沿邊地區，為石窟寺的開鑿提供了經濟基礎。北宋時期，陝西北部人口最大的特點就是連年戰爭導致軍人數額巨大。隨着西夏的崛起，為抵禦西夏進犯，北宋政府常年在西北沿邊駐紮着大量軍隊。到北宋中葉，由於西夏威脅逐步升級，尤其在經歷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敗後，關輔震動，北宋朝廷大量往西北增兵。至治平三年(1066)，陝西駐軍人數(不含鄉兵)已劇增至“四十五萬九百餘人”，而同期河北駐軍僅有“三十萬一千餘人”²³，可見陝西駐軍數量之大。即使如此，陝西邊臣依然頻頻奏請增兵，以備禦西夏²⁴。據記載宋末麟、府、豐三州共有人口1.2萬人，但是，該地的禁軍卻多達1.8萬人²⁵。鄜延地區處於戰爭前沿地帶，駐軍狀況也大致相仿。

戰爭補給也會帶來巨大的戰時人口和消費。如《宋史·食貨志》記載，元豐四年(1081)，河東路轉運使，調民夫11000人隨軍參加運輸，“一夫僱直約三十千文以上，一驢約八千文”。同年，京西南路轉運使，調均州、鄧州一帶民夫三萬往陝西鄜延路運糧，“自入陝西界至延州程數，日支米錢三十、柴菜錢十文，並先並給。陝西都轉運司於諸州差僱趁乘人夫，所過州交替，人日支米二升”²⁶。

戰爭也帶來了巨大的商機。宋夏沿邊地帶設立了不少榷場，每個軍事堡寨附近也逐漸形成了規模不等的市場，當然也少不了沿邊地區的走私貿易²⁷。因戰事活動而來的人口、消費和商業活動，給鄜延地

²³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〇八，第5053頁。

²⁴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〇八，第5053頁。

²⁵ 郭琦《陝西通史·經濟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750頁。

²⁶ (元)脫脫等《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第4256-4257頁。

²⁷ 相關研究可參見：金勇強《北宋西北沿邊堡寨商業化研究》，《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第105-109頁；楊方方《北宋西北沿邊地區市場發展及其區域特徵》第二章“鄜延路沿邊市場發展及其特徵”，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區帶來了巨大的財物，這也成爲北宋時期這一地區大量開鑿石窟的經濟基礎。若沒有如此大量財富的湧入，我們很難想象在經濟落後的西北邊地延州建造起如此多的石窟寺，特別是在剛剛建立不久的沿邊軍事堡寨安定堡附近開鑿如鐘山石窟這樣規模宏大、造像精美的石窟寺。

(三) 安定堡決定了鍾山石窟的軍事屬性

安定堡，北宋慶曆五年(1045)置，以延川驪馬川新築城爲堡。位於延安府北方，控清澗川一帶，長期處於宋夏交界的極邊地帶，乃是西夏從北方進入延安的門戶，軍事地位至關重要，因此成爲宋夏民族政權在陝北沿邊地區爭奪的焦點之一(圖11)。《宋史》卷三三一《楚建中傳》記載，“元昊歸款，建中白府請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控東道，夏人果來，聞有備，不敢入”²⁸。可見安定堡軍事地位之重要。同時，北宋軍隊還將安定堡作爲屯駐糧草之地，元豐四年(1081)，宋軍五路會攻興州時，鄜延路種諤領兵出綏德城，與麟府路兵會師夏州，“是日，種諤離夏州，遣曲珍等領兵通黑水、安定堡路，接運軍糧”²⁹。安定堡因宋夏戰爭而建立，終北宋一朝，始終處於抵禦西夏的軍事前沿陣地，因而具有強烈的軍事屬性。安定堡的軍事屬性決定了它的一切活動均是以爲戰爭服務爲首要目的。

2010年，第23-39頁；陳旭《宋夏之間的走私貿易》，《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97-109頁。

²⁸ (元)脫脫等《宋史》卷三三一，第10667頁。

²⁹ (清)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點校《宋會要輯稿》卷一七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76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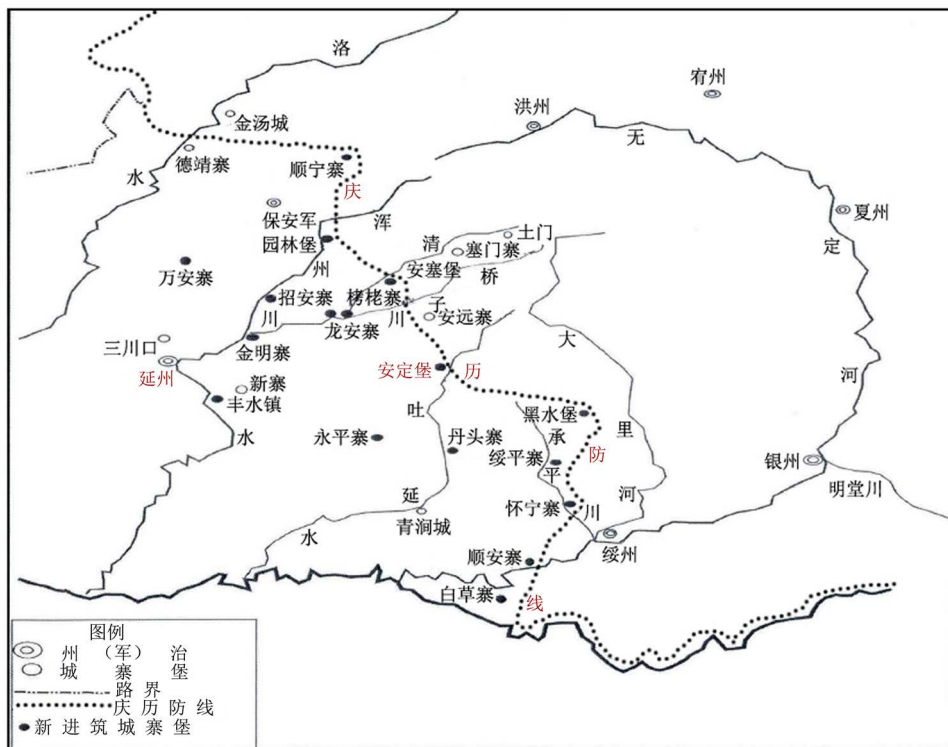


圖 11 北宋慶曆年間廊延路邊防地理示意圖（此圖依據朱瑞《北宋廊延路邊防地理探微研究》第 19 頁圖 3-1 略作修改，朱文圖片底本為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年，圖 18-19“永興軍路”）

鍾山第 10 窟的功德主以來自於安定堡的漢蕃軍民為主。從前述治平四年開窟題記“□州界安定堡百姓張行者發心打萬菩薩堂”一語可知，這位來自安定堡的佛教信徒張行者顯然是石窟開鑿的牽頭人和組織者。石窟所見造像功德主也以來自安定堡及周邊地區的漢蕃軍民為主，進一步佐證了該窟與安定堡之間的密切聯繫。軍人功德主包括來自於禁軍、鄉兵、蕃兵、弓箭手等不同兵種者。禁軍以駐守陝西的保捷軍為主，其中所見同州保捷人數最多，“駐泊同州保捷第二十二指揮使李元”，“駐泊同州保捷第二十二指揮軍頭單宗已下五都十將節級至長行”，“同州保捷第五十二等指揮人員，兵級二十口人員，

發心脩觀音菩薩一尊，□□□□貳拾捌人□得□□二十二指揮，參人都頭，孟□、雷千、□忠，壹拾壹人□□級，鄧□、楊進、雷漸、同□、陳明、田□、王信、彭榮、趙保、王元、張□，玖人長行，十元□元，王全、楊成、□成、趙青、楊林、王□、黨進、楊□、張成，壹名同勝第五指揮都頭張貴”；另有“華州保捷弟六十八指揮使潘濟”，“鄜州保捷弟一指揮杜義”。除駐守陝西的保捷軍之外，還有來自中央兩司三衙的軍人，“東京步軍司虎翼左第一軍第六指揮有長行共廿二人等”，“殿前司虎翼右二七指揮長行清信弟子李遇”。來自鄉兵者有“供備庫使延州東路同都巡檢使兼安定堡寨主陳采”。蕃兵有“安定堡番落弟七十指揮弟一都長行李功”。弓箭手有“本堡弓箭手王友、王大、賀文友等三人”。這些軍人顯然是因宋夏戰爭需要而從各地而來駐守於此的。非軍人功德主者同樣以安定堡百姓為主，如“安定堡百姓張文秀脩菩薩八尊”、“本堡郭行者脩□四尊”、“本堡施主脩佛十八尊”，題記中未註明籍貫者大多也是安定堡當地百姓。另外還有個別來自周邊地區者，如“延川保王琪”、“臨真縣樊令□”等。可見，該窟正是由安定堡的漢蕃軍民共同營建的一座佛教石窟寺。

正如前文所述，鍾山石窟正是伴隨着安定堡的設立而開鑿的，安定堡漢蕃軍民共同出資營建了鍾山第10窟，鍾山石窟與安定堡緊密相關，鍾山石窟作為附屬於安定堡的佛教寺廟，同樣具有非常強烈的軍事屬性。考察造像題記，我們會發現其中兵將和下級官吏者占功德主的超半數，而且由這些兵將和官員出資雕刻的造像一律是較大的龕像，普通百姓大多出資開鑿一些小像。

三、鍾山石窟：宋夏邊境上的護國萬菩薩堂

鍾山第10窟是陝北宋金石窟中最早出現萬菩薩造像者，且該窟在治平四年開窟題記中被明確命名為“萬菩薩堂”，這在陝北石窟中是唯一一例，足見洞窟開鑿者對萬菩薩信仰的強調。那麼萬菩薩造像到底有何特殊功能呢？

唐大曆二年(767)不空曾在化度寺萬菩薩堂組織法會，為國念誦祈福，並稱之為護國萬菩薩堂。不空《請抽化度寺萬菩薩堂三長齋月念誦僧制一首》中列化度寺文殊師利護國萬菩薩堂三長齋月念誦僧二七人並附言：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伏以化度寺護國萬菩薩堂，並依臺山文殊所見，乘雲駕象凌亂盈樑，光明滿堂不異金閣。奉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恩命，賜香兼宣口敕，命不空簡擇念誦大德，及命寺主智藏專檢校道場。其前件大德等，或業茂真言學通戒律，或敷宣妙旨轉讀真乘，望抽住於此中。每年三長齋月精建道場為國念誦，必有事故隨闕續填。其堂內外施及功德一物已上，茲請三綱專句當冀不遺漏。

中書門下牒大廣智不空三藏（牒祠部准此。令史趙昌、主事薰意、郎中雀漪）。

牒奉 敕宜依牒至准 敕故牒。

大曆二年二月十六日 牒。³⁰

³⁰ (唐) 圓照集《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大正藏》第2120號，第52冊，第834頁下欄17行至第835頁上欄14行。

不空稱此萬菩薩堂為“護國萬菩薩堂”，且每年三長齋月要“精建道場為國念誦”，可見萬菩薩堂自唐代始即具有濃厚的護國色彩，這也成為萬菩薩造像最為重要的功能。

甚至到元代，萬菩薩的護國色彩依然非常強烈，元成宗（1295-1307年在位）曾專門下詔在五臺山修建了“萬聖祐國寺”，並在帝師迦羅斯巴的推薦下，請行可大師為第一代主持。《元史》卷二八《英宗本紀》“至治三年（1323）四月條”記載：

敕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揚子江金山寺、五臺山萬聖祐國寺，作水陸佛事七晝夜。³¹

可見，從唐到元，萬菩薩均具有強烈的護國色彩，這也正是萬菩薩信仰能持續流傳，且得到統治者重視的直接原因。宋夏戰爭背景下，在北宋西北極邊地區安定堡，當地漢蕃軍民在官方的支持下耗費巨資營建這樣一座萬菩薩堂，其護國安民、保佑邊地和平的功能不言自明。

結語

綜上所述，從治平四年開窟題記內容可知，萬菩薩造像是鍾山石窟最為重要的造像題材，因而洞窟開鑿者將該窟命名為“萬菩薩堂”。至遲從盛唐開始，萬菩薩已經從五臺山文殊信仰中脫離出來，

³¹（明）宋濂等《元史》卷二八，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630頁。

成爲了一種獨立的崇拜偶像。李唐以降，由於萬菩薩信仰具有濃厚的護國思想，因而得到官方，特別是皇家的推崇。鍾山石窟位於北宋鄰近西夏的極邊地區，是由安定堡漢蕃軍民共同出資營建，受軍事堡寨安定堡的影響，鍾山石窟也具有了強烈的軍事屬性。安定堡漢蕃軍民期望鍾山石窟萬菩薩堂能護國安民，保佑天下太平。

附記：本文未註明出處圖片為筆者拍攝、繪製或標記。

